

郭嵩燾等著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鈞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鈺·王立誠 編校

#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

郭嵩燾 劉錫鴻  
薛福成 宋育仁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郭嵩燾等著;王立誠編校.-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6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錢鍾書主編)

ISBN 7-108-01146-8

I. 郭… II. ①郭… ②王… III. ①郭嵩燾-文集-清后  
期②中外關係-史料-清后期 IV. Z42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98) 第 16013 號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

|      |                                   |
|------|-----------------------------------|
| 著者   | 郭嵩燾                               |
| 責任編輯 | 潘振平                               |
| 封庫設計 | 寧成春                               |
| 版式設計 | 陸智昌                               |
| 出版發行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br>(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 |
| 郵編   | 100010                            |
| 經銷   | 新華書店                              |
| 印刷   | 北京新華印刷廠                           |
| 版次   |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
| 開本   |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 印數   | 六三五×九六〇毫米十六開                      |
| 字數   | 三千冊                               |
| 定價   | 三十五萬二千字 印張三十四·一二五<br>四十八元         |

# 編者說明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的晚清編，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

遴選的學者和論著，着眼於學說有新意，有己見，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

結集則不拘一格，以專題為主，每種或收一人一書，或輯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

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選擇底本，取原校較精的刊本；異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覆核引文，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重施標點，包括分段；編製索引，分人名、書名兩類。

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附於篇前。導言既重可讀性，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也重學術性，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為行文簡明，諸導言凡引證出處、攷訂史實或商榷

疑義，均以附注形式陳述。

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晚清編擬分輯刊行，初定每輯十種，先成先印。如可按設想出齊，當能略見系統性。

這套選編，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錚組織實施。

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由於種種緣故，長期不克面世。現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

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同時期待高明指正。

# 編例

一、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底本。以原刊為主，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誤，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一般不作理校。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於正文不作改動。

節錄。於篇題下注明，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

標點。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概施以新式標點。

分段。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讀者。

注釋。作者原注概從原刊。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譌誤，以頂注出之。

譯名。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譌誤，則由編者逕予改正。為方便閱讀，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

版式。概用繁體字，直排式。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均改為通行繁體字。原作或有雙行夾注，現均改為單行夾注。

索引。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書名兩種索引，以便通檢。

二、本叢書所選諸種，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予以保留，並移作附錄。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 導言

朱維鐸

## 壹

在技術不發達的中世紀，使節、旅行家和商人的域外遊歷見聞，向來是人們知天下事的信息來源。且不說作為同時代世界性帝國的漢唐元明諸王朝，有作為的君主都何等關注域外情形，被宗教的或凡俗的激情所驅使的僧侶、官員和平民，都何等具有冒險精神。就說清帝國的頭兩代君主，順治帝和康熙帝，仍然沒有喪失關注西方現狀的熱情。康熙帝敢於起用西方傳教士充當外交顧問和測繪全國版圖的主持人，便是顯例。

使清帝國與近代西方出現隔膜的，是在十八世紀相繼君臨中國的雍正、乾隆父子兩代統治時期。這個時期長達七十七年。從雍正起厲禁西方教士入華，也切斷了來自西方世界的信息源。而乾隆晚年一再傲慢地拒斥英、荷等國的通使要求，更使清帝國喪失了同西方國家建立平等的正式關係的良機。那時歐洲北美正處在民主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進程中，還無力跑到遠東進行大規模的軍事的商業的競爭。

當半世紀後清帝國再度考慮要不要同西方使節打交道，那時的外交態勢已非復昔比。帝國給



西方人的印象，不再是如拿破侖所說的東方睡獅，而是如馬克思所形容的「陳腐世界的代表」〔一〕。

在長時間的躲閃、推宕、敷衍、爭執之後，清帝國當局終於無可奈何地同意，各國公使可以「覲見」皇帝而不行跪拜禮，這已是在後者強行駐京以後十三年的事。〔二〕再過兩年，即一八七五年，仍然迫於外來壓力，帝國當局才不得不派遣常駐外國使節〔三〕。「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的蒙昧狀態〔四〕，總算由此有了較大改變。

雖說駐外使節的揀選，駐外使館的組建，以及使領等官員的活動方式，都經常散發着晚清官場的腐敗氣息，但派遣常駐外國使節這一事實，除了意味着「來而不往」式外交體制的結束，至少還溝通了帝國政府與外國政府直接交往的渠道。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王公大臣們覺察到這一渠道的重要，因而從開始起便規定出使各國大臣，必須以日記形式，定期向政府報告駐在國情形，並及時翻譯咨送有關中外交涉事宜的書報議論。〔五〕這項規定，以後沒有得到恪守，但在初期還是有效的。

據統計，自一八二一年道光帝嗣位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帝病死的四十年間，中國學者撰著的域外地理圖書共二十種，而那以後至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的四十年間，國人所撰著的外國情輿地著作，便約有一百五十一種。〔六〕就是說，後四十年較諸前四十年增多了七倍半。而後四十年百五十餘種的六十一名作者，其中大半是駐外使領參隨等外交官員。可見晚清與外國通使以後，至少在獲得「天下萬國」的直接知識方面，中國的學者文士得益匪淺。

不待說，如果以爲曾經任職於駐外使領館，便必定通曉外國情形乃至國際形勢，那將如咸、同間旗人到過廣東者「即視爲通洋務」〔七〕的說法一樣可笑。事實上，從清帝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起，到一九〇〇年在位的七名公使止，二十多年間清朝派駐外國的三十餘名使節，通外文的可能只有曾紀澤、伍廷芳數人。非但使領館首長不懂駐在國語言，連他們的隨使人員也多半不懂外文並缺乏外交常識。〔八〕正如曾任駐美駐俄公使的楊儒，在一九〇〇年的一通奏疏中所抨擊的，「如謂曾辦外交，而舉凡所謂西學西法者遂無所不曉，不亦左乎！」〔九〕

然而人們仍然重視這班使節及其參贊隨員的遊歷見聞。他們的記敘未必可靠，議論或許膚淺，甚至曲學阿世，以挑剔攻訐異域政治文化爲能事。但重要的不是他們的陳述的客觀性，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出現在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後的西方世界的首批中國使者。帝國外交官員的身份，使他們得以貼近觀察歐美諸國的權力運作狀況，得以連續俯瞰工業化世界的社會生活概貌，得以經常接觸具有不同影響力的政客、官僚、貴族、財閥以及學者、文士等等。中西社會文化的差異，又使他們的觀察的敏感度，感受的對比度，較諸久客異域者更爲強烈，尤其是因爲他們總在雙方政治衝突的前哨位置上。所以，他們的遊歷見聞，便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展現出晚清中外文化學術的互相衝突，在飽受傳統薰染的上層士大夫中間，可能激發的種種反應。

## 貳

這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選輯的便是晚清四名外交官員所留下的六種日記或筆記。

這四名外交官員，就是首任欽差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和他的副使劉錫鴻，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福成，以及薛福成後任龔照璦的駐英使館二等參贊宋育仁。

在一九〇〇年前留下的成百種使西記載中間，我們選取這四人的六種日記或筆記，輯為一冊，乃出於如下考慮：第一，他們首先都是駐英外交官，所記也都以在英倫的見聞為主，而英國非但是率先用武力打破清帝國大門的國家，並且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在當時仍居西方列強之首。第二，他們在英國的時間雖有先後，但活動範圍和觀察對象大致相同，而且都不通任何一種西方語言，就是說見聞所受主觀限制相同。【一〇】第三，他們都屬於晚清「正途」出身的漢族士大夫【一一】，有的還是同治、光緒年間主張「新政」的所謂知洋務人物，並且顯然都屬於如後來張之洞所說「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的那種「知本」人物【一二】。

不待說，基於以上理由，這四人遵照清政府的同一規定，在出使期間所撰寫的同類記載，對於同期同國的社會狀況的描述和評議，便足以引起後人的研究比較的興味。何況他們的日記或筆記，已明白昭示各人的眼光不同，見解亦異，甚至相互牴牾，如郭嵩燾與劉錫鴻。因此，將這四人的六種使西記載合為一編，無疑更便於我們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了解晚清中外政治文化交往的這特殊的一頁。

### 叁

作爲「出使英國欽差大臣」的首膺人選，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在五十七歲那年受命前後，便一直是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二三】

這位湖南湘陰的舊式商人家族的子弟，當初棄賈業儒，原來只求以文章名世。【二四】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他中了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即皇家學院研究生，幾乎接近實現夢想。但太平天國起義，迫使他走上違反初衷的道路。據說曾國藩終於同意出面倡辦團練，左宗棠終於同意投身反太平軍行列，都是接受他的勸說【二五】。他本人也成爲湘軍的一名謀士。但他內心又對「官逼民反」的起義懷着某種同情，居然在日記中寫道：「今致亂之原，官耳，吏耳」；「未有官吏之路不清，而能勘（戡）定亂離者也。」【二六】他爲人爽直，「好危言激論」【二七】。作爲他的姻親的曾、左，自然都深知他這種思出其位的想頭。加以曾、左有矛盾。因而他對湘軍雖有運籌帷幄之功，但在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曾國藩却不同意保舉他擔任地方大吏，左宗棠更在他任廣東代理巡撫與總督因公爭議時踢了他一腳。【二八】此後他就罷官閑居。

直到一八七五年二月，光緒初元，郭嵩燾才被恩准復出，授福建按察使。就在這時，馬嘉理案發生，清英關係緊張，似乎又要進行戰爭。垂簾聽政的太后趕緊發揚「臣主」，要求各省大吏就海防問題各抒己見。據總理衙門報告，收到的條議中「有以擇交儲才出使爲要者」，於是擬訂了一份堪備任使的九人名單。【一九】郭嵩燾本來不在其列，但他應詔所上的一份條陳【二〇】，令

當軸想起了他早有「知洋務」的名聲，於是突然成了使英大臣的首選〔二一〕。

這份差使顯然不值得羨慕，非但首要任務是就馬嘉理被戕事代表四歲的「大皇帝」向英王道歉，而且旅程需歷七萬里風濤，令安土重遷的士大夫們無不聞之色變。然而在等待出使的十三個月裏，郭嵩燾却成了「公論」的抨擊對象，鼓噪最烈的是他的湖南同鄉。面對「舉世嘩笑」，他曾想稱病躺倒不幹。他的副使許鈴身便曾藉此理由脫身，甚至連一衣帶水之隔的東鄰日本都不肯去〔二二〕。然而頂不住太上女皇親自出面說服動員，他還是「包羞忍詬」，赴英上任了〔二三〕。豈知「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二四〕，使他剛抵異國，便不想再說話。

惹禍的原因，似乎是他赴英途中所記的日記，即本書全錄的《使西紀程》。梁啟超就持此看法〔二五〕。

確實的，《使西紀程》才刊行便「有詔毀板」，時在光緒三年六月〔二六〕。據說是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對此書的彈劾所致。但清廷禁止它刊行的時間，已在郭嵩燾抵倫敦近半年之後。因而郭嵩燾自述赴任「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不可能指這一事件〔二七〕。

顯而易見，參奏郭嵩燾的，另有人在，而且此人必定就在他的卧榻之旁。那是誰呢？當時的各種記載，一致證明清帝國首次派駐英帝國的使館成員，從參贊官黎庶昌以下，包括翻譯官、隨員等，都是由郭嵩燾遴選奏派的。其中有漢人、旗人，還有洋人，雖與郭嵩燾有親有疏，却都不可能打小報告中傷他。這非但由官場慣例可知，而且由清代「祖制」早已規定非有君主認可的特殊身份便不得享有密摺奏事特權的成例可知〔二八〕。而在郭嵩燾身傍並唯一享有這種特權的，只

有同被「欽命」的副使劉錫鴻。而事實早已表明，甫抵英倫便「一參再參」郭嵩燾的，也正是這位劉錫鴻。應該說，劉錫鴻並不諱言自己肩負的特殊使命，相反却引以為榮。他的《英輶日記》，便是明證。

## 肆

郭嵩燾屬於學者型的政治家。他不滿意清代漢學，以為研究經史而專注名物訓詁，是捨本逐末，但他觀察域外情形，事物鉅細都好刨根尋柢，頗有漢學家的精神。他的《使西紀程》的記載之精審，曾讓實地驗證後的曾紀澤為之嘆服（二九）。但他更不滿意清代理學，以為尊崇程朱而不去實踐「聖賢修己治人」的大法，危害世道人心更甚。因而他特別推崇王夫之，以為從朱熹以後，唯有王夫之才真能稱作理學家，懂得「踐履體驗」的道學精微。

看來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等著作，曾對郭嵩燾起過很大影響。他的會心之處，自然不是王夫之的那些仇夷狄、賤商賈的議論，而是王夫之所謂「無其器則無其道」，強調治道只存在於時變之中的基本歷史觀念。王夫之痛詆「孤秦陋宋」的言論，對於正受「清議」攻擊的郭嵩燾，印象似也極深，因為他對當時「公論」的回擊，恰如《宋論》批判南宋、晚明士風的回聲。

「竊以為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急於倣照西法，以立富強之基。」「雖使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三〇】

如此見利忘義，主張用夷變夏，已夠令衛道君子們憤慨了。更讓他們切齒的，是此公甫離父母之邦，便接連上疏主張「禁鴉片煙以清理學校爲先」，還居然列舉必須首先戒毒的對象，包括督撫大吏、文武職官、舉貢士紳和駐防八旗。「三」這不僅是指斥舉國官紳都已腐化透頂，而且公然藐視特權者行爲不受法律檢束的成例。尤可惡的，是他的以下說法：

「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算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民生，無一人引爲疚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鄉僻壤；江浙風俗，至於捨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劄剛以家譚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嘩，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賸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其愚不可殫矣！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一二鴉張無識之士大夫，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鴉張無識者爲之也，今且下移於羣不逞之頑民。無有能考覽史事，體察民情，以知其所以然者。」

雖說這段議論，明顯帶有當年王夫之指責宋明末季士風的痕迹，並不新鮮，但仍大大刺痛了那班以「清流」自命的士大夫。於是就在「上諭」將郭嵩燾疏批轉各省官員討論之後不久，何金壽彈劾郭嵩燾的奏章便上呈了，罪名是「有貳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罪證便是《使西紀

程》。【三二】

《使西紀程》不過是旅途實錄，單憑其中幾則稱道西洋「政教修明」的簡單觀感，實不足以定罪。例如，較諸當時正被士大夫重新記起的《海國圖志》作者魏源，在三十年前所寫的香港紀遊詩將這塊殖民地比作蓬萊仙境，郭嵩燾的香港觀感便平實得多。因此，慈禧太后對於何金壽劾章的答覆，便只是下詔將《使西紀程》的刻板銷燬。

應該說，罪其書而不罪其人，在清代文網史上已屬破例。這當然不是由於慈禧太后心地慈善，而是因為郭嵩燾背後站着辦外交的實力派的緣故。然而發出的信息是清楚的，「文母」對於彈劾此人是持鼓勵態度的。於是，劉錫鴻又該起作用了。他以目擊者身份，向朝廷舉報郭嵩燾「三大罪」，外出參觀因天寒而「披洋人衣」，出席英宮音樂會「屢取閱音樂單，倣效洋人所為」，另附密摺彈劾郭氏另有十罪。郭嵩燾被迫申辯，反受「上諭」申斥。【三三】

在這種情形下，一貫把辦洋務、講外交視作辱國喪權，並把對外強硬乃至不惜一戰視作維護「我大清」體統的不二法門的「清流」主角，如不出場，那倒是怪事。果不其然，張佩綸以經筵講官的身份上疏了，題目便是《請撤回駐英使臣郭嵩燾片》，彈劾的依據還是《使西紀程》。疏中暗示慈禧太后，說是「禁其書而姑用其人」，原已不合祖宗成例，但更可怕的是這種「權宜之計」的相反效應，「愚民不測機權，將謂於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非特損國體而已。」【三四】

慈禧太后顯然被嚇住了。她臨朝稱制，擅立光緒，在清代都屬史無前例，況且那時她與恭親



王之間的叔嫂鬥法正在加劇。因而她一怕非議其言行不合祖制，二怕民心由不穩而再度造反。同、光間以敢言著稱的所謂清流派，正是利用她的僭主心態，用支持她擅權固位做代價，博取「極論時事」的說話特權的。既然清流領袖張佩綸都如此警告，正中她的心病，那麼她在清流與洋務兩派明爭暗鬥中間，迅即向不利於洋務派的一邊傾斜，當然合乎邏輯。

於是郭嵩燾便活該充當犧牲了。還在《使西紀程》被禁後，他便緘口不言，甚至對劉錫鴻在駐英使館內部日益跋扈，視他若無物，也「一切含忍」〔三五〕。他雖然照樣作日記，却不再循例報送總理衙門，而且秘不示人，直到死後近百年才公諸於世。那態度包含着怨憤，但並沒有妨礙他執行公務，在英在法的公眾場合都努力維護帝國體面〔三六〕，並在劉錫鴻離英赴德的當晚便着手整頓使館內部風紀〔三七〕。可是，那樣的昏闇朝廷，那樣的腐朽體制，區區一名被褫奪說真話權利的駐外公使，又能有什麼作為呢？於是他的前程理當終結。

這裏不擬詳述郭嵩燾關於晚清社會政治的總體見解。本書選輯的內容，着眼於體現郭嵩燾等，作為晚清不同類型的專職外交人員，同在西歐，更其同在英國，對於近代西方文化，所作出的異樣反映。郭嵩燾無疑是堅定的「洋務」派，堅定到只顧學西方以圖富強而不顧可能危及帝國祖宗成法的地步。他的觀感未免膚淺，他的見解未免謬誤。但和同時同地同任的劉錫鴻的《英軺日記》相比照，他們關於同事同物同制的相異記載，讀起來却頗有趣味。